

由於傳播科技的發展與運用，戰爭訊息的傳遞速度加快，在兩次波斯灣戰爭中，傳播媒介已成為戰爭的平台，敵對雙方的宣傳戰與心理戰都透過電視媒體在進行，戰爭不僅科技化與媒介化，也公關化。

公關化戰爭的首要目標是在控制新聞中的框架，也就是掌控框架的權釋權。公關化戰爭的核心過程是訊息的發展與傳播，而在傳播過程中的主要目標是「操縱」或「確保」新聞的再現能利己。

在民主國家中，為了要師出有名，公關化戰爭的重點工作之一就是媒體輿論塑造，一方面要將敵方的首腦予以妖魔化，另一方面要強調出兵是為了解救受害者，維持公理與正義的必要手段。當戰爭正式開打後，公關化的策略轉化為作戰武器的一種，一方面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另外一方面採取「消失美學」的策略，讓戰爭成為是一種任天堂電玩般的戰爭型態。而確保淨化戰爭任務達成的關鍵則是所採取的媒體管制與管理的策略。對於友善的媒體藉由提供各種「媒體服務」之名，將媒體工作者轉為免支薪的戰爭宣傳員，而對於不友善的媒體則採取各種困窘的策略，甚至是「意外」攻擊媒體記者住處與人員的策略。

第六章 波斯灣戰爭中的媒體「假事件」分析

第一節 前言

在本書第二章中提到，傳播媒體在國際危機與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之一是作為戰爭的武器與工具，也就是作為宣傳戰與心理戰的工具。基本上，自從新聞傳播媒體出現後，就始終與戰爭有著密切的關聯，透過對於媒體的掌控與運用能夠在戰時發揮極大的力量，成為戰力的一部份。

在現代傳播媒體尚未出現與普及之前，宣傳活動主要是透過耳語等人際傳播管道來進行。運用殘暴事件的曝露作為宣傳工具，來獲取同情與攻擊敵人是最為古老的心理戰的策略之一，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十字軍東征時(Taylor, 1990)。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傳說土耳其將俘擄的十字軍加以虐待後，收集他們的眼淚，然後裝在木桶中，作為娛樂之用，後來傳說發現到此一木桶，因而激發十字軍的瘋狂鬥志(國防部總政戰部編，1993:12)。普法戰爭時，也盛傳有一法國的七歲幼童，持玩具手槍指向普魯士的哨兵，導致當場被槍殺，後來也產生極大的宣傳效果(國防部總政戰部編，1993:12)。

這些假資訊(disinformation)或假事件(pseudo-event)

除了可以將敵人妖魔化，以激發敵愾同仇外，政治人物也會用假事件來形塑出一個團結與民眾崇拜的假象，這類事件包括凱撒大帝(Caesar)在獲得重大軍事勝利後進入羅馬城的盛大歡迎場面，以及1930年代在德國紐倫堡(Nuremberg)的大集會等(Somerville, 2001)。

在現代媒體出現後，許多戰爭的決策者很快的就知道運用這些「新媒體」來作為宣傳戰與心理戰的武器。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敵我雙方均大量的運用各種傳播媒介來作為團結民心士氣與醜化敵人的工具。在本書第二章中已論及，國際政治宣傳可以用來辯解己方的行動、吸引未來的盟國、在占領區穩定秩序、使敵軍喪失士氣、嚴厲批評對方的領導人或譴責戰爭等。

在第二章中也指出，國際關係中的四種傳統工具包括外交、外貿、傳播與武力。從本質上而言，在所有對外關係各工具或策略中，本身如果不是傳播的行為，也會非常依賴各種的傳播管道。Fortner(1993)指出，透過傳播媒介來進行的公共外交經常與其它傳統的外交方式互補合作，其主要運作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透過國際廣播電視來影響它國人民對於一些議題的認知，特別是國與國之間的思想或意識形態若差異甚大時；(另外一種則是藉由媒體公關的「假事件」，吸引國際媒體的大幅報導，這些經由精心策劃的假新聞事件包括記者招待會、具鮮明主題的活動，或外交、經濟的高峰會議等(楊曉紅與王家全譯，2005：160-161)。

also
ccp?

在本書第五章中已提及，越戰失敗的經驗與教訓，使美軍開始有計劃的進行一系列的公共關係改革，而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瞭解到，傳播媒介在影響民意動向方面有著顯著的影响力，而民意的動向會左右戰爭的決策。因此，在現代的戰爭中，戰爭決策者除了運用傳播媒介作為妖魔化的工具外，也要注意消除或不呈現負面的戰爭題材，並且還要選擇正面的故事情節。

本章主要的目的是在分析兩次波斯灣戰爭中的重大假事件，檢視假事件是在何種背景下被產製出來，而這些假事件的目的又是什麼與假事件是如何被敘述，以及在假事件中的媒體角色。本章採用敘事分析法來檢視1991年與2003年波斯灣戰爭中，分別具有特殊性與代表性的「媒體假事件」：科威特醫院的「保溫箱嬰兒」暴行事件與 Jessica Lynch 的拯救事件。本章研究問題有三個：第一、在兩次波斯灣戰爭中，兩個個別假事件產生的背景與目的為何？第二、這些假事件是如何的被敘述？故事情節為何？第三、媒體在假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在第一章中已提及，敘事分析法是始於卜羅普對於民俗故事結構的研究。他將故事的角色功能區分為32種，儘管不同的傳奇故事中，有許多不同的人物，但主要有7種：英雄、壞人、贊助人、協助人、公主與她的父親、派遣者與假英雄等。Chatman(1978)將敘事區分為故事本身與論述。黃新生(1992)將故事的講述分成講故事的人(teller)、故事情節

(tale)和聽取故事的人(listener)。張梨美(1997)指出,角色的敘事者永遠是包括在敘事的層面中,他/她可以是其所說的故事的積極參與者,也可以是一個見證者。敘事者所創造的故事其實無法與社會經驗脫節。

Kanjirathinkal 與 Hickey(1992)研究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將「神話的劇本」(mythical drama)分為四個階段:英雄的請求、與邪惡對抗、完成使命與回歸。本章將參考這些分析架構來進行敘事分析。

本章計有五節,第一節前言;第二節相關文獻檢視;第三節分析科威特醫院「保溫箱嬰兒」暴行事件;第四節檢視 Jessica Lynch 拯救事件;第五節結論。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本單元將針對假事件、宣傳戰、女性與戰爭等相關理論與文獻進行檢視,以作為後續分析的參考架構。

一、假事件與媒體策略

(一)、假事件的定義與特徵

Boorstin(1961)將「虛假事件」(pseudo events)定義為

是由消息來源所完全控制的媒體產物。有「公關之父」之稱的 Bernays 也稱之為「假事件」,而《民意》一書作者李普曼則稱之為「虛假環境」(轉引自張巨岩,2004:73)。虛假事件並非是自然發生的,而是經過預先設計與策劃,主要在引發新聞傳播媒體的注意,並且加以報導,進而影響公眾(翁秀琪,1996;臧國仁,1998)。虛假事件只有在透過新聞、廣告、電視或其它形式媒介的傳佈與再現後,才會被社會大眾視為是「真的」與「有意義的」活動或事件。

Boorstin(1961: 11-12)歸納出虛假事件的特徵有四個:(一)事件本身不是自發性的,而是有某些人加以設計、安排或激發出來的;(二)安排虛假事件主要是為了被報導或再製(reproduced),其出現已被安排容易被媒體報導或再製;(三)虛假事件與藏在事件深處的真實之間的關係是模糊的,而事件的新聞性與吸引力遠比事件的真或假來得重要;(四)事件本身要具備能自圓其說。

虛假事件由於經過精心策劃,通常內容較具戲劇性,會比一般社會真實事件更為有趣與刺激(Boorstin, 1961)。一個虛假事件是透過精心設計出來的舞台布景、腳本和演出,創造出與事實無關,但卻又令人相信的形象。一個成功的虛假事件,由於腳本、布景與演出都充分利用現實生活中的道具,使人很難區分出真實與虛假。因此,可以說,經由媒體所報導的虛假事件就是一種「照鏡子效應」,因為可能會使社會深陷於一個事先經過規劃製作的世界中。也就是如同後現

代主義者布希亞所提出的「超真實」(hyperreality)、擬仿(simulation)與擬象(simulacrum)。布希亞(Baudrillard, 1983: 2)認為，在原作與複製品間的主要差異已被摧毀的過程，就是一種擬象，也就是一個沒有源頭或現實的真實為模型而產生，也就是超真實。其結果是「那再也不是模仿，也不是複製，而是替代了真實的符號系，真實再也沒有機會可以製作自身。」(洪凌譯，1998: 16)。

有學者(如 Katz, 1980; Katz, et al., 1981, 1984; Liebes and Curran, 1998)曾針對 Boorstin 所提出的假事件概念加以深入檢視，認為製造假事件的消息來源已將媒介現場轉播效果加以考量，因此，常會在「假事件」中添加戲劇性或情緒性的情節，使閱聽眾能感同身受，甚至暫停其它日常工作來共同體驗此一「歷史」經驗。國內傳播學者臧國仁(1999)就曾指出，這些虛假事件的內容通常可能會包含一些特定的英雄人物，進而塑造出新的英雄人物。

虛假事件使得媒體的採訪報導成為一種包裝的問題，不管事件本身是事實或者是幻想，媒體只呈現出這些經過凍結的事件，其目的就是經由設計出來的「真實化的表現形式」來掩蓋住社會真實或政治形勢，進而使社會生活變成是一種形象櫥窗，或是創造出有用的政治形象或有利情勢(Boorstin, 1961; Bennett, 2003)。

(二)、媒體策略與假事件

由於媒體的虛假事件是製造出來的，因此，在本質上是

屬於媒體策略的一種。而媒體策略的具體意涵為何呢？Spitzer(1993: 199)認為，媒體策略是消息來源能夠使媒體報導或者是在媒體曝光的一種影響力的展現。翁秀琪(1996: 128)指出，媒體策略是「為了能上媒體版面所發展出來的所有文字的(如背景資料、新聞發布等)或行動的(如集會、公聽會、示威遊行)策略」。她進一步指出，消息來源發動媒體策略的行動力，可以用來作為分辨其權力高低的指標，然而兩者間並不是線性的關係。儘管如此，還是可以被用來作為判定消息來源的「媒體近用」(access to media)資源多寡的基礎。

創造媒體事件(media event)是一般社會團體或企業組織最常使用的一種媒體策略(臧國仁, 1999; Miller, 1987; Howard and Mathews, 1985)。公關人員運用事件或活動來影響新聞媒體的報導已有一段很長久的歷史(臧國仁, 1998)。Bernays(1928: 11-13)曾說：「公共關係的專家不僅要知道新聞的價值為何，而且也要瞭解，他可以讓新聞發生。他是事件的創造者。」「如果他能將一個構想加以確定並導演成事件，那麼該事件就會很快地成為被大眾所瞭解的新聞。」

Molotch 等人(1987: 36)表示，假事件概念的重點是屬於新聞媒體的外在操控行為，對新聞媒體而言，此種外在操控行為是一種常態，而不是一種特例。分析其原因之一是因為公關產業的出現與公關活動的盛行，企業與政府都想要透過媒體來從事公眾宣傳(publicity)，因此，會製造出一些活

動或事件來吸引媒體的報導。蔡體楨(1992)指出，有經驗的公關活動策劃者，常能敏銳的掌握社會脈動，趁機造勢，將假事件與新聞媒體聯合，創造出所要達成的目標。在公關人員的精密策劃下，新聞媒體組織在某些情況下很容易會中了公共關係策略的圈套，或者是基於媒體自身利益的主動配合下，創造出政治、財經與影劇等新聞的假象。

假新聞散播的方法有很多種，較少被人注意的是由 Bernays 所常採用的「第三人認同法」。例如，美國國防部的消息有時會透過英國媒體或者是其它國家的媒體散佈出去，以利達到消息與消息來源的關係疏離，增加消息的可信度(張巨岩，2004：51)。

(三) (二)、兩次波斯灣戰爭中的假事件

在第四章已提到，假事件的歷史由來已久，在波爾戰爭與法普戰爭中都曾出現過假事件。曾任《紐約先鋒論壇報》編輯的 David Wise 指出：「美國開國以來，就存在著向新聞說謊的事實。」他更進一步指出，以往，政策的形成是為了適應現狀中的事體，而今，事件卻被製造與操縱，以配合政策(轉引自楊月蓀譯，1995：148)。Lee 與 Solomon(1990)認為，政府的體制性說謊，是在冷戰開端與秘密作業開始泛濫之際，才有了新的規模(楊月蓀譯，1995：148)。

Lakoff(2003)在分析美國對伊拉克的公共外交戰中發現，主要是採用將國家比擬為個人，來為戰爭的發動進行辯護，因此，將世界各國對於戰爭所採取的立場區分為，友善

國家、敵對國家、流氓國家等。

Lakoff(2003)認為「國家就是個人」的比喻中，常用的幻想故事(fairy-tale)有兩種：自我防衛與拯救故事。在故事中總是有英雄、罪犯和壞蛋等角色。壞蛋在本質上是邪惡與不理性，而英雄如果無法與壞蛋來理性的討論，就必須要擊垮他。

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美國總統老布希強調伊拉克海珊對於世界石油供應與「我們生活」的威脅就是屬於自我防衛的故事。由公關公司 Hill & Knowlton 所策劃的伊拉克「薩繆爾威特」的一連串指控，最後導致美國加以拯救，就是拯救故事的典型代表作。

2003年波斯灣戰爭中，美國總統小布希宣稱，海珊與凱達組織(A1 Qaeda)與恐怖主義組織有關聯，以及海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都是屬於防衛性的故事，而拯救伊拉克人民與為中東地區帶來民主等則是屬於拯救故事。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未被發現時，就開始將自我防衛的敘事轉移成拯救敘事。在美軍中指部的新聞簡報中，一再的重複伊拉克士兵著平民服裝，對美軍進行伏擊，此外，也強調，伊拉克對平民進行攻擊，與脅迫民衆參與作戰等(Heibert, 2003)。

英國《獨立報》在2003年7月13日曾詳細列舉了在2003年波斯灣戰爭中的20個主要謊言(張巨岩，2004：49-50)：

1. 伊拉克要為911恐怖攻擊負責。
2. 伊拉克與「基地組織」有瓜葛。

3. 伊拉克從非洲尋找鈾以用於「重新製訂的」核武計劃。
4. 伊拉克企圖進口鋁管來研製核子武器。
5. 伊拉克仍擁有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所遺留下來的大量生化武器。
6. 伊拉克保留著可攜帶生化彈頭的 20 多枚導彈，其射程可以對在塞普路斯的英國軍隊構成威脅。
7. 海珊擁有製造天花病毒的能力。
8. 美英聲明得到了武器查核人員的支持。
9. 以前進行的武器查核都是以失敗收場。
10. 伊拉克阻礙武器查核人員的查核工作。
11. 伊拉克能在 45 分鐘內將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完成部署。
12. 伊拉克隱藏基礎設施的檔案。
13. 美國將輕鬆贏得戰爭。
14. 烏姆斯蓋爾守軍投降。
15. 巴斯拉發生叛亂。
16. 「拯救」女兵 Jessica Lynch。
17. 聯軍部隊將受到生化武器的襲擊。
18. 審問伊拉克的科學家，他們將會供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藏匿地點。
19. 推翻伊拉克政府後的石油收入將用在伊拉克人民身上。
20.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已被發現。

同樣地，在兩次波斯灣戰爭中，伊拉克政府也會採用假事件來進行宣傳戰與心理戰。例如，CNN 於 1991 年就曾報導說，有一位操著流利英文的伊拉克婦人訴說著美軍不攻擊平民的說法是一種謊言，因為美軍的攻擊行動已造成許多伊拉克平民的傷亡，結果後來被證實這一位婦人的真實身份是伊拉克的官員。這位婦人也同時操著法語出現在法國的電視新聞中 (Alter, et al., 1991:38)。

二、宣傳戰

從傳播理論的發展歷程來看，賀夫蘭等人所進行的宣傳與說服研究，可以說是早期較為重要的傳播研究成果之一，而這些研究成果在後來的相關宣傳與說服研究中也一再的被引用。

Lasswell (1934) 認為宣傳的目的主要有四個：動員對敵人的仇恨、保持盟友對我們的友誼、保持中立者對我們的友誼和爭取中立者的合作、以及破壞敵人的士氣。

以下分別針對宣傳戰的類型、宣傳戰的發展、以及宣傳戰的策略與工具加以論述。

(一)、宣傳戰的類型

國際政治宣傳通常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白色宣傳 (white propaganda)、黑色宣傳 (black propaganda) 與 灰色宣傳 (gray propaganda) (Fortner, 1993；胡光夏，2005；方

鵬程，2005、2007)。

✓ 白色宣傳是指宣傳的消息來源可以清楚的辨識，而其所傳遞的訊息大致上是正確的，較少出現欺騙或謊言。例如，BBC和「美國之音」所進行的廣播常被稱為「白色政治宣傳」。

✓ 黑色宣傳的消息來源通常是偽造的，且訊息中充滿著大量的謊言、虛假與欺詐，並以誇大不實的方式來傳播對手的壞處。例如，1986年美國在空襲利比亞之前，曾散佈利比亞強人格達費即將被推翻的消息。在冷戰的東西陣營對抗中，蘇聯地下電台也曾散播愛滋病毒(AIDS)的發生是由於美國從事生物實驗的結果，蘇聯並曾假造一些美國文件來誤導資訊活動，以及發佈偽造的軍事統計數字和技術資料等(Fortner, 1993; 胡光夏, 2005)。

假資訊、骯髒伎倆(dirty tricks)和共謀的新聞記者(co-opting journalists)等則常被用來描繪與黑色宣傳相同的宣傳作為(Hachten, 1993)。假資訊(disinformation)這個字源自俄文dezinformatsia,是蘇維埃國家安全局(KGB)專門從事黑色宣傳的部門(方鵬程, 2005、2007)，據稱在莫斯科有大約有1,500多人在從事這項工作(Hachten, 1993)。假資訊不只是消息來源與內容的錯誤或誤傳而已，有時也會採取計畫性的作為，由潛伏的間諜記者，撰寫一連串新聞內容，來向目標的個人、團體或國家，散佈、傳遞或證實不完整或錯誤的資訊，主要目的是在弱化敵人(方鵬程, 2005)。

✓ 灰色政治宣傳介於白色與黑色宣傳之間，消息來源不一定能正確辨識，而訊息也是不確定的。Fortner(1993)指出，灰色政治宣傳的目的是很明顯的，但傳送的位置卻極為隱密。

(二)、宣傳戰的發展

在戰爭中，有關資訊傳播的運用通常被稱為「言語武器」(word weapons)、「紙彈」(paper bullets)和「心智的彈藥」(munitions of the mind)。Taylor(1997)將在戰爭期間所運用的資訊戰和心理戰稱之為「心智競賽」(mind games)。

美軍聯合心戰準則將心理作戰界定為「計畫性的傳送經由選定的訊息與指標(indicators)給國外的閱聽眾，以影響他們的情感、動機和思考，最終是要影響外國政府、組織和個人的行為」(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3: I-1)。

有鑑於傳播在現代的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Taylor(1997)認為，除了傳統的指揮和管制的戰爭(command and control warfare 或者 2CW)之外，應該增加傳播(communications)、情報(intelligence)和電腦(computers)，而變成4CIW。

Elliul(1965:9-12)曾指出總體宣傳與媒介運用的重要性，他說：

✓ 宣傳必須要總體的。宣傳家必須要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報紙、廣播、電視、傳單、會議、親身說服……每一種媒介都具有其獨特的穿透力，但因其個別的侷限性……一種媒介的效果有限，

因此，要透過其它的媒體來互補。……宣傳家必須運用所有工具，除了大眾傳播媒體以外，還要包括新聞檢查、法律條文、提議立法、國際會議等。

在現代，用於實施媒體戰略的另一個傳播工具是網際網路(張巨岩, 2004: 16)。

基本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宣傳戰和心理作戰僅被認為是附屬於戰爭，而不是神奇性的替代武器。儘管認為單憑言語是無法贏得戰爭，但卻有助於削弱敵人的有形戰力，以及較容易處理敵軍投降的相關問題。在冷戰期間，大部份的西方國家都將宣傳視為是陸海空三軍以外的第四軍種，而心理作戰則是第五軍種(Taylor, 1997)。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美軍的宣傳工作從獨立戰爭即已開始，當時的軍隊曾運用周刊型的報紙來報導戰況，而美國的開國元勳如亞當斯、傑佛遜與富蘭克林等人，都曾為這些周報撰寫文章，藉以激勵軍心士氣。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電影與廣播等媒體，繼報紙與雜誌相繼出現後，均陸續被運用於戰爭中，來從事宣傳戰與心理戰，而由於戰爭中充滿各種的資訊，使得世人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稱之為「第一場資訊戰爭」(the first information war)。美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已在陸軍情報部門設立了心理作戰組，並在遠征軍司令部情報部門下設立宣傳科，當時的主要心戰媒體是傳單(Paddock, 1989)。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運用各種的宣傳手法，

獲取了德國民眾的信任，並進而發動了戰爭。

冷戰時期，美國展開與蘇聯共產集團的對抗，美國的宣傳機構由原來的外國新聞處(Foreign Information Service)改為戰爭新聞處(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後來又轉型為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唐棟, 1996)。

(三)、宣傳戰的策略與工具

學者曾歸納宣傳常採用的策略有 7 種：咒罵法(name calling)、裝飾法(glittering generality)、轉移法(transfer)、證言法(testimonial)、平民法(plain folks)、堆牌法(card stacking)和樂隊車法(band wagon)(Lee & Lee, 1939; 翁秀琪, 1996; 方鵬程, 2005、2007)。

咒罵法是將敵對的個人或團體賦予名稱、貼標籤、扣帽子的方式，以醜化對象的特徵。裝飾法是以響亮的名稱、好的用詞或冠冕堂皇的語詞，對贊同的人、事、物加以擁護和歌頌。轉移法是利用人們會「聯想」的心理，將受人尊重推崇的事物轉移到所要宣傳的事物上。證言法是引用受閱聽眾尊敬或嫌惡的人，來談論某一事件或產品的好或壞。平民法是為了拉近與閱聽眾的關係，特別強調宣傳者與平民百姓是相同的。堆牌法則是透過選擇和運用一連串事實來舉證，或不斷引用誤導資訊，使宣傳對象持續向極好或極壞的情形累積。樂隊車法是宣傳者刻意營造主流氛圍或創造流行趨勢，試圖使個人加入群體，一起跳上花車，以免陷入孤立。

前文已提及，傳播學者 Manheim 曾表示，由於形象塑造的技術突飛猛進，傳統所採用的公共關係一詞，已不足以能表達其複雜性，因此，應該改為「戰略性政治傳播」。也就是說，政治傳播學家常絞盡腦汁運用各種符號手段來達到形象塑造的目的。

三、女性與戰爭

在戰爭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二種，一種是作為擁有武器可以作戰或自保的女性軍人，另一則是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然而，不論是那一種角色，在戰爭敘事中，最顯明的角色還是受害者(沈明室，2003；虞立莉，2003；Kumar，2004)。

De Pauw(1998)指出，女性在戰爭敘事中，主要扮演的角色有五種：受害者(victim)、激勵者(instigator)、部隊勤務支援者(camp follower)、主導戰爭的女強人(virago role)與女戰士(androgynous warrior)。

在戰爭中，作為受害者角色的女性可能會遭受到敵人的強暴與虐待，以及面臨死亡的威脅等，而必須由男性來加以保護。例如，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徵兵海報中，突顯一位大壞蛋強行擄走一名充滿驚恐、裸露半身的白人女性(Kumar, 200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逼迫亞洲國家如中國大陸、韓國與台灣等國女性擔任部隊的慰安婦。

Slotkin(1973)以美國為例，將女性作為受害人的「被俘場景」(captivity scenarios)追溯到17世紀，當時白人印第安人綁架白人女性為藉口，來為種族屠殺(genocide)做辯護。Jeffords(1991)則指出，此種受害敘事是屬於「保護場景」(protection scenario)。她以 Stiehm(1982)的保護者、被保護者與防衛者的三種角色為架構，將保護場景中的角色區分為三種：被保護者/受害者(受到壞人迫害的人)、威脅者/壞人(攻擊受害者的人)、保護者/英雄(從攻擊者的手中解救或保護受害者的人)。Jeffords(1991)指出，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就是以此種邏輯來辯護軍事介入，也就是科威特被壞蛋海珊與伊拉克所蹂躪。

女性在戰爭中除了扮演典型的受害者角色外，還扮演著「激勵者」的輔助角色。例如，在許多的文化中，女性扮演著激發男性作戰的功能，如果男性不勇於參戰，就會受到女性的唾棄。就如同，以前台灣文化對於一些因故無法當兵的男性，認為是沒有經過當兵「洗禮」的人，是一個不成熟，無法展現男性氣概與挑起家庭重擔的人。此外，女性同胞在家鄉中，綁黃絲帶等待參戰官兵歸來等方式，都扮演著類似的功能。

女性在戰爭中扮演後勤支援者的角色，主要是負責供應飲食、衣服與補品等服務的角色。此外，女性所提供的服務還包括擔任醫護人員(特別是護士角色)與提供參戰官兵性服務等。Enloe(2000)的研究就指出，通常各國為了避免參戰

官兵強暴當地婦女、提高軍心士氣與防制性病傳染等考量，軍隊通常會鼓勵或默許嫖妓行為、或者設立軍中樂園¹。

與一般女性在戰爭中所扮演的截然不同的角色是作為主導戰爭的女強人。例如，英國伊莉沙白女王一世、俄帝時期的 Catherine、以及 1980 年代英國首相 Margaret Thatcher 等，她們都扮演著戰爭領導者的角色。

最後，女性則是扮演著如亞馬遜的女戰士角色，直接英勇地參與戰鬥，就如同電影中的女藍波。

虞立莉(2003: 16)指出，美國有史以來，女性直接加入戰場人數最多的戰爭是 2003 年波斯灣戰爭，據估計大約有 4 萬名女性擔任戰鬥支援與勤務支援的任務。儘管美國女性軍人人數已超過現有兵力的 15%，並且在軍中 80% 以上的職務均可以見到女性的身影，但仍不得加入以直接地面戰為主要任務的戰鬥部隊(沈明室，2003)。因此，可以說，女性軍人仍扮演著傳統上需要男性保護的角色(虞立莉，2003；Kumar，2004)。

¹ 例如台灣以前在金馬前線設立 831，來滿足前線官兵的性需求。

第三節 科威特醫院「保溫箱嬰兒」暴行事件

美國總統老布希在 1991 年獲得聯合國授權出兵攻打伊拉克前，必須要採取雙重的作為，一方面要為出兵提供正當的理由，另一方面要將敵人妖魔化(Jamieson and Waldman, 2003)。基本上，這兩項工作是一體兩面的工作，因為在將敵人妖魔化後，就會使得出兵的正當性獲得鞏固，而為了要替出兵找藉口，又必須要尋找各種的暴行事件。科威特醫院的「保溫箱嬰兒」暴行事件是典型新聞管理與操作中的妖魔化策略的案例。

在前文中已提到，Lakoff(2002)認為「國家就是個人」的比喻中，有自我防衛與拯救故事兩種常用的幻想故事。科威特醫院中的保溫箱嬰兒暴行事件就是屬於拯救的故事，也就是期望經由揭發敵人殘暴的罪行，來加以妖魔化，希望能夠喚起英雄(指美國)能從壞蛋(伊拉克)的手中解救受害者(科威特)。

一、敘事分析

(一)、故事情節

在 1990 年 10 月 10 日，一名化名為「Nayirah」的 15 歲小女生，出現在美國參議院人權委員會前做證。她聲淚俱下

的做證表示：

我是剛從科威特逃離出來，我在科威特時，目睹到伊拉克的士兵持槍進入醫院。這些士兵將 15 名嬰兒從保溫箱中取出來，拿走保溫箱，並將嬰兒放置於地上，任其死於冰冷的地板上。這種場景是令人毛骨悚然。我不由自主的想到早產的姪子，可能也死於當天（轉引自 Jamieson and Waldman, 2003: 15:60 minutes, 1992, 0119; MacArthur, 1993: 58; Kellner, 1995; 張巨岩, 2004: 94）。

在 Navirah 做證結束後，參議員 John Porter 表示說，人權委員會成立 8 年以來，已經聽過世界上許多違反人權的事，但從沒有像今天所做證的事，這麼的沒有人性、兇殘和邪惡。他表示，文明世界的人應該聯手，採取任何的可能行動，來解救科威特，並且將此一邪惡者加以去除。許多看到此一報導的民眾，包括美國總統在內，都表示，當在 CNN 看到此一報導時，都感到非常的震驚 (60 minutes, 1992, 0119; 轉引自 Jamieson and Waldman, 2003: 15-16)。

Jamieson 與 Waldman (2003) 指出，不清楚為何老布希總統會感到震驚，因為在 Navirah 做證的前一天，布希已經知道消息來源是科威特的王室，也瞭解到，這個故事可能不是真實的。但老布希表示，當時在美國的科威特王室，是「從心底來做此一陳述」(speaking from the heart)。換句話說，「從心底來做此一陳述」被作為可信賴的真誠證明。

在 Navirah 於國會作證結束後，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的報告也曾指出，有 312 位嬰兒在伊拉克士兵從保溫箱加以取出後死亡的訊息 (MacArthur, 1993; Jamieson and Waldman, 2003)。後來，科威特駐美大使 Sheik Saud Nasir al-Sabah 於 1990 年 10 月 16 日在 CNN 的 Larry King Live 節目中也曾引述這位年輕女性的證詞與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作為伊拉克在科威特的暴行佐證 (Jamieson and Waldman, 2003: 17)。

到了國會投票表決是否進行軍事行動的關鍵時刻，美國新聞界和國會都估計死在毫無人性的伊拉克士兵的嬰兒可能高達 312 名，因而促使國會中許多的議員支持開戰的決議 (Rowse, 1992; Bennett, 2003)。

(二)、角色分析

此一故事中的角色主要可以分為 5 種：說故事者、贊助者、協助者、英雄與壞人。

1. 說故事者

故事中的主要陳述者是 15 歲女生 Navirah。她的角色是兼具目擊者與指控者，由於她年紀輕，一般人不認為她會說謊，再加上她生動的「演出」，確實能打動聽故事的人心。

在此一事件經由媒體報導後，媒體本身也成為一個隱藏的說故事者，再加上許多的政治人物，包括美國總統老布希、副總統奎爾 (Dan Quayle)、參議員與許多的軍事將領等，都不斷的再轉述此一故事，使得說故事的人愈來愈多。以美國

總統老布希為例，他在一個月內公開提及這一個故事⁶次，在44天內提及了8次(Mickey, 1997: 278)。這些人物在政治上都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對於民意的動向有著潛在的影響。

2. 贊助者

此一故事在被敘述時，沒有呈現出來的是隱藏在背後的兩個贊助者，即科威特王室與 Hill & Knowlton 公司。

科威特王室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期間，總計付了1千多萬美金請 Hill & Knowlton 公司負責所有在美國的公關工作(MacArthur, 1993: 50)。因此，科威特王室是整個事件揭發的贊助者，但其角色是隱藏的，因為其目的是希望能引起美國民意的同情，進而能出兵，協助收復失去的國土。

Hill & Knowlton 公司則是真正提供給故事陳述者魔法的人。整個事件是由該公司經由科學調查與研究，所精心策劃的一系列假事件的活動。Hill & Knowlton 公司除安排 Navirah 至國會做證外，並提供許多的訓練，使她能夠在國會做生動的演出，「賺取」世人的淚水與敵愾同仇之心。

3. 協助者

在 Navirah 於國會作證完後，為了強化故事的真實性與說服力，曾有一位科威特的醫生也做證表示，他曾親手埋了被伊拉克拿走保溫箱而死亡的14名嬰兒。由於有這位具專業背景醫生的背書，使得整個事件的說服力大為增加。因此，這

位醫生是協助 Navirah 達成目標的重要輔助者之一。

4. 英雄

在整個故事中，並沒有明顯的提到英雄人物，只有等待救援的無辜嬰兒。然而其中隱涵的是說故事者 Navirah 本身就是一個英雄。她年紀輕，卻能強忍著悲傷，勇於揭發此一慘絕人寰的事件，是具有無比的勇氣。

另外在故事中所訴求的是，希望英雄能夠適時出現，來解救科威特，而這英雄就是美國，也就是正義之師的美軍。

5. 壞人

故事中將會和英雄戰鬥的壞人就是以海珊為首的伊拉克政權，包括協助其為非作歹的軍隊。這些壞人不僅無故侵吞科威特國土，還漠視無辜的嬰幼兒生命。

(三)、場景分析

此一事件的場景可以分為三個部份。首先是事件的真正發生地點，也就是科威特 al-Addan 醫院的嬰兒房。這一個場景是悲慘故事的發生所在地。傳統上，醫院是屬於一個濟世救人的地方，但卻變成是一個屠殺生靈的場所。雖然聽故事的人並沒有親眼目睹，但經由場景所隱涵的強烈對比，卻能深深撼動人心。

其次則是故事的敘述地點，也就是美國的國會。民主國家的國會是民意的重要殿堂，人民的請願活動大都選在此一場地進行。國會代表了能為民伸張正義的場所。在國會中所說的故事，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使故事的流傳速度更

為加快，且透過電視媒體的畫面，使得整個控訴能生動的呈現在閱聽眾的面前。

最後，整個故事的大場景是亡國的科威特，也就是飽受伊拉克蹂躪下的科威特人民生活的景況。此一故事所代表的是在被統治下的科威特縮影，因為戰爭中最为無辜的剛出生嬰兒都會受到迫害，何況其他的人呢？

二、事件分析與討論

(一)、事件真相

Harper 雜誌的發行人 MacArthur 於 1992 年 1 月 6 日的《紐約時報》中就曾揭露，化名為 Nayirah 是科威特駐美國大使的女兒，是科威特王室的成員之一。他在 1993 年出版的《第二戰線：波斯灣戰爭中的管制與宣傳》(Second Front: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the Gulf War*) 書中再度陳述此一事實。

科威特政府在流亡後，為了復國，期望美國能夠派兵協助收復失土，因此，皇室成員以 1,050 萬美元聘請 Hill & Knowlton 公司在美國進行一系列的政治公關活動 (McArthur, 1993; Mickey, 1997: 278)。而 Hill & Knowlton 公關公司總裁 Craig Fuller 在老布希擔任副總統時，曾擔任他的幕僚長，本身是其忠誠的支持者，他在擔任公職期間曾參與許多公關活動的策劃 (Kellner, 1995)。

事實上，這個女孩的證詞也是 Hill & Knowlton 公關公司所精心策劃的公關活動的一部份 (Rowse, 1992; Jowett, 1993a, 1993b; Kellner, 1995; Bennett, 2003)。Nayirah 是由公關公司帶到美國國會，並且教導與訓練她如何在國會人權委員會中作證的技巧與要領。Hill & Knowlton 還製作了一卷適合電視播放的公關新聞影片 (video news release, VNR)，這個 VNR 不僅在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晚間新聞中播放，也被送往大約 700 個電視台，估計收看的美國人數達 3,500 萬人 (Bennett, 2003)。

科威特醫院的伊拉克暴行事件真相，在戰後就不斷的被批露。1991 年 3 月 15 日，美國 ABC 記者 John Martin 曾透露，在親自訪問故事中的醫院時，經由訪談醫院的員工，就已發現這個故事是虛構的 (轉引自 Jamieson and Waldman, 2003: 18)。

中東觀察組織 (Middle East Watch) 執行長 Andrew Whitley 於 1992 年 1 月在《60 分鐘》的節目中曾表示，他的一位同事在科威特復國後，曾到 al-Addan 醫院訪問當時值班的醫護人員，他們都表示，這個事件是不曾發生過的 (轉引自 Jamieson and Waldman, 2003: 18)。

MacArthur (1993) 也指出，參議院人權委員會的共同主席 Tom Lantos 在聽證會前，就已經知道 Nayirah 就是科威特駐美大使的女兒。雖然有參議員否認知情，但科威特駐美大使本人宣稱，有兩位參議員知道 Nayirah 的身份 (轉引自

Jamieson and Waldman, 2003: 19)。

1992年1月17日，ABC的「20/20」節目報導，曾作證親手埋了14名死亡嬰兒的醫生表示，他其實是牙醫，他向電視台證實，他並沒有進行驗屍，所以也不曉得這些嬰兒的真正死因(Kellner, 1995: 207)。ABC電視台也揭發，Hill & Knowlton 公關公司曾以焦點團體進行研究，以瞭解何種事件最能激起美國民衆的同仇敵愾之心，研究發現嬰兒事件的效率最好，因此，就選擇此一事件當作公衆宣傳的策略(Kellner, 1995: 207)。

1992年8月Kroll Report公佈，儘管醫院在當時有至少7名嬰兒死亡，但並沒有屠殺嬰兒的事(Mickey, 1997: 278)。

基本上，在第一次波斯灣期間，運用假證人做證的手法不只「保嬰箱慘案」(incubator atrocities)一樁。例如，曾在聯合國安理會以科威特難民作證的一名婦女 Fatima Mutawa，其真正的身份是科威特計畫部部長的妻子，以前是科威特電視節目的主持人(MacArthur, 1993: 65)。

(二)、目的

在1990年科威特被伊拉克強行併吞後，表面上與Hill & Knowlton 公關公司簽約的顧客是「自由科威特公民」(citizens for a free Kuwait)組織，但其幕後的真正身份卻是科威特王室。

Hill & Knowlton 公關公司在與科威特簽約後，就展開

了一系列遊說美國出兵的公關活動。也就是由 Hill & Knowlton 策劃的一系列活動，最後才促使美國承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Trento, 1992; Mickey, 1997)。

Hill & Knowlton 公關公司也在聯合國與美國國會籌辦了伊拉克暴政統治的照片展，這些活動都被電視台廣泛的報導。此外，Hill & Knowlton 公關公司也協助科威特難民訴說被虐待的情事，對美國國會進行遊說，以及為媒體準備影像和文字的資料等(Kellner, 1995)。

該公司曾安排媒體組織對科威特人進行採訪，並促成訂定了「全國自由科威特日」、「全國(科威特)祈禱日」等，來組織公共集會，並向媒體傳送「科威特人質來信」等新聞資訊(張巨岩, 2004: 97)。科威特醫院中的伊拉克暴行事件是整個大計劃中的一個項目，但卻是令人最為動容的一件經過精心策劃的媒體公關事件。

此一故事曾被老布希用來作為動員民衆支持戰爭的利器(McArthur, 1993; Kellner, 1995; Jamieson and Waldman, 2003)。例如，1990年11月1日他在麻州 Mashpee 的演說中提到，海珊與他的軍隊，就如同希特勒入侵波蘭時一樣，試圖以武力來壓制科威特人的反抗與勇氣。他們已犯下野蠻人的暴行，將嬰兒從保溫箱中取出，將保溫箱送回巴格達，棄這些嬰兒於不顧。在同年11月22日在對中東地區 Dhahran 的聯軍演說中表示，當你聽到從海珊暴政中逃離出來的人所說的故事，你會覺得很反胃，例如在科威特醫院中的暴行(轉

引自 Jamieson and Waldman, 2003:16)。

對於美國政治領導者而言，此一故事一再被引述與傳誦可以達到一箭雙雕的效果。一方面，將海珊類比為與希勒一樣，可以將敵人加以妖魔化，另一方面，可以駁斥美國發動戰爭是為了中東油田的指控(Jamieson and Waldman, 2003: 16)。也就是說，美國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了人權，而不是為了石油，因為反對派一直以「不要為石油而戰」(no blood for oil)作為反戰訴求。

Kellner(1992a: 71)指出，

這是一種精緻的欺騙、假資訊與大謊言的網絡，主要是用來向公眾銷售戰爭。這顯露了美國總統、副總統與高階的軍事將領們都是宣傳者，為了要贏取對於戰爭作為的支持，毫不遲疑的不斷重複此一大謊言。

總之，此一事件是由科威特政府所籌劃的宣傳策略，主要是希望美國人民能支持出兵解救該國，而老布希政府則運用此一事件來達到自己的目標(Kellner, 1995)。

(三)、事件如何被傳誦

Mickey(1997: 279)指出，整個事件的擴散可以分為3個層面：首先是 Navirah 在10月份的國會證詞，其聲淚俱下的指控，受到媒體的大幅報導，而並沒有任何媒體質疑事件的真實性；其次是，媒體對於此一殘暴事件的持續報導，從1990年10月至1991年1月，《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與《華

爾街日報》等都持續提到此一殘暴事件；最後則是，美國總統與政治人物不斷重複引述此一殘暴事件。

Navirah 在揭發殘暴的「真實故事」後，也獲得美國電視媒體的大幅報導，包括 CBS 新聞雜誌「60分鐘」與 ABC「黃金時間現場」(primetime live)等(Jowett, 1993a, 1993b)。

上文已提及，老布希總統在一個月提到這個故事6次，在44天內提到了8次。副總統奎爾也常在許多的公眾場合中提及，其他的軍事將領包括史瓦茲柯夫與軍事發言人也常提到。7位美國參議員在1991年1月12日通過授權出兵決議案的演說中也引述了此一故事(Kellner, 1995)。

第一次波斯灣戰中，儘管有許多的事證與理由被用來作為發動戰爭的藉口，但保溫箱故事卻是最常被主戰派引用來作為發動正義戰爭的理由。例如，在參議院做成決議前，這一故事被引用6次，而在整個有關戰爭的論辯中，總計被引用了多達22次(Jamieson and Waldman, 2003: 18)。

(四)、媒體角色

在整個事件中，媒體很顯然是扮演著共謀的角色，並沒有善盡新聞媒體監督政府，以及針對事件進行深入查證的職責。

上文已提到，在戰後不久，美國 ABC 電視台記者就已發現整個故事是虛構的，但為何美國媒體沒有持續的進行追查，以及密集的揭發此一虛假事件呢？

Kumar(2004)指出，美國媒體不願意積極揭發假事件的原

因有三。首先，正如 Hanson (2003) 指出的，新聞記者對於「感覺很好」(feel good) 的報導，通常都不會加以戳破，特別是當自己參與其中之時。

第二、從媒體的結構而言，媒體組織會參與戰爭故事的建構與傳送的原因是，軍方的公關操作從越戰後愈來愈精緻，而習慣依賴官方作為可靠消息來源的媒體，在身處戰爭迷霧中，且又無法加以查證時，當然就只有配合演出。

第三、媒體與軍方的合作結果是互利的，媒體是自願而不是在被迫的情況下來加以傳播。媒體可以藉由報導動人故事而獲得較高的收視率，而政府則可以達到宣傳的目的。

第四節 Jessica Lynch 拯救事件

在 2003 年由美國所主導的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中，拯救 Jessica Lynch 的新聞是最受到廣泛報導的新聞之一。據 Hanson (2003) 統計，在她獲救後的 14 天中，美國媒體的報導總計出現了 919 則報導，遠遠超過了美軍中指部發言人 Tommy Franks 將軍的 639 則，以及國防部長錢尼 (Dick Cheney) 的 549 則。

一、敘事分析

Jessica Lynch 的拯救事件依照劇情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拯救的故事 (從 2003 年 4 月 2 日，Lynch 被救前的一日開始到被救後的兩週)、英雄/公主歸來 (第一階段後到 7 月 22 日返回西維吉尼亞州的家)、媒體宣傳獲利 (11 月 5 日至 11 月 17 日，Lynch 密集公開接受媒體訪問與相關影片播放期間) (Kumar, 2004)。由於本章是著重在虛假故事的分析，因此探討的焦點將僅集中在第一階段的拯救故事。

整個事件的主角是美國女兵 Jessica Lynch，她於 2003 年 3 月 23 日遭到伊拉克軍隊伏擊而受傷被俘，而美軍出動特種部隊於 4 月 1 日，冒險進入敵軍陣地將她從醫院救回。

(一)、故事情節

史帝芬·史匹伯拍攝了一部名為「拯救雷恩大兵」的電影，該部電影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不惜重大犧牲，來拯救雷恩的故事情節，影片曾風靡了全球。而在 2003 年波斯灣戰爭期間，美軍也拯救了一名女大兵「Jessica Lynch」。此一事件宛如電影情節般，不僅戲劇性十足，也有許多扣人心弦的懸疑情節。

西維吉尼亞州巴勒斯坦郡的二兵 (private) Jessica Lynch 隸屬陸軍第 3 機械化步兵師 507 維修連。該連在伊拉克的主要任務是負責維修空軍第 52 防砲旅第 5 營的裝備與車輛。Lynch 是擔任補給的任務 (陳竹梅, 2004; Kumar, 2004)。

2003年3月23日當天，Lynch所屬的507連是擔任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600輛車隊中的殿後部隊。在車隊的行進當中，Lynch與幾個連上的弟兄迷路了，後來察覺是身處於Nasiriya城市的交戰區中。而就在當天，美軍與英軍的地面攻擊部隊遭到伊軍的頑強抵抗，造成頗為慘重的人員傷亡。據估計，至少有20名美軍失蹤或陣亡，並且有50多名人員受傷(Kumar, 2004)。

「拯救Lynch」的影片是由美國國防部提供給隨軍深入的戰地記者，片長5分鐘左右。整個影片是利用夜視鏡拍攝，影片顯示Lynch躺在擔架上，緊緊捏著胸前的美國國旗，神智還算是清醒，臉上充滿著驚恐，無法言語，由特種部隊人員護送上直昇機(陳竹梅, 2004; Potter, 2003; Kumar, 2004; Kellner, 2005)。

美國媒體引述官員的說法指出，Lynch所屬的部隊遭到伊拉克軍隊的伏擊，雙方激烈交戰一個半小時，Lynch始終奮勇抗敵，身體多處受傷，直到體力不支，彈盡援絕，最後才被俘(自由時報, 2003, 7月23日: 12版)。

媒體引述軍方消息人士指出，美軍為了搶救Lynch，派遣陸戰隊的戰車與裝甲運兵車為前導，對市中心發動佯攻，並佔領幼發拉底河的橋樑，但實際的目標卻是突擊醫院救出Lynch(聯合報, 2003, 4月3日: A14版)。

CNN在2003年4月1日以「它是如此再顯身手」為題，來報導美軍的救援行動；CBS電視台在4月11日以「這是一

件歷史的故事，Jessica回家了」來加以報導；《時代雜誌》在4月14日的專題報導中，將此獲救事件歸類為好萊塢般的電影情節故事或者是如Kellner所形容的「真實電視節目」(a reality TV show)(張巨岩, 2004; 陳竹梅, 2004; Kumar, 2004, 2006; Kellner, 2005)。

(二)、角色分析

1. 說故事者

表面上擔任Lynch拯救事件的主要說故事者是媒體，但其實隱藏在整個事件的說故事者是美國國防部。由於國防部是影片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事件的主導者，在整個自拍自導中，透過公關新聞影片的提供，敘說著整個英勇救人的好萊塢情節故事。而在其中最為成功的是，其透露的管道是經由隨軍深入的戰地記者，也就是在文獻探討中所提到的第三人認同法。

2. 贊助者

在整個故事中的贊助者角色，也就是提供魔法給英雄的人是美國的主流媒體。儘管整個事件是經過策劃的公關假事件，但由於媒體的配合演出，使得原本默默無聞的Jessica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全美與全世界家喻戶曉的人物。美國民眾以各式各樣的方式來表達對她的關懷，並引頸期盼她的早日歸來。

3. 協助者

協助者是指促使整個故事能戲劇化與正當化的角色。媒

體主要是引述僅透露姓 Mohammed 的伊拉克律師的目擊證詞，來戲劇化此一事件。媒體引述 Mohammed 的話表示：「我看到他們（指伊拉克軍人）毆打這位女性軍人，我的心跳都快停止了。」（轉引自 Lynch, 2003: A1）。這一段內容就刊登在 2003 年 4 月 4 日《今日美國》(USA Today) 頭版。Newsweek 也引述了 Mohammed 的話說「一位粗壯身穿黑衣的捕捉者以手掌和手背重重的掌摑她的臉。」(Adler, 2003: 46)。這一敘事又經由救援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人員加以證實 (Kumar, 2004)。

美國媒體的報導提到，這一位伊拉克律師的目擊證詞，是促使美軍決定採取突擊軍事行動來拯救這一位被俘女性軍人的重要因素 (Lynch, 2003)。

4. 受害者

在此一假事件中，Lynch 扮演著雙重的角色，既是需要受保護的受害者，但同時也是一位英雄。

受害者的形象是從三方面的敘事中呈現出來的：身材的嬌小、非戰鬥單位的成員、以及受到伏擊受傷 (Kumar, 2004)。此三種敘事的核心焦點是，Lynch 是一位女性，她無法保護自己。

首先，媒體持續的將她描寫成是一位「嬌小」與「可愛」的 19 歲女孩。許多媒體所刊登出來的照片，「證實」了她身材的短小。

其次，在上文已指出，儘管美國女性加入軍隊人數已大

為增加，但仍被限制不能直接參與與地面的戰鬥部隊，因此，大都是參與戰鬥勤務支援的工作。由於非戰鬥單位，在戰術與戰技等方面的訓練就不是其專長，這可以從 Lynch 遭受到伏擊時，槍枝卡彈等就可以瞭解到，戰鬥勤務支援部隊仍需受到戰鬥單位的保護。

最後，Lynch 在受傷後，其受害者的身份更從被俘後受到虐待，更加以突顯出來。

5. 英雄

在此一故事中的英雄角色有 2 種，包括 Lynch 與美軍特種部隊。

首先，Lynch 雖然是一位受害者，但同時也是一位英雄。Lynch 的英雄故事是經由媒體、政治人物與家人的敘述中，加以呈現出來的。

媒體報導她在受到伏擊時，儘管受傷，但仍英勇的抗敵。此外，媒體對於她能夠勇敢地撐過此一段被俘的期間更大為讚揚，特別是從男性軍人的口中來說出的。在 CBS 播出的新聞中就有一位男性受訪者(空軍上尉)提到：「我不確定我在這種情形下是否能挺的過去。我身高 6 英尺 2，體重 200 磅，而她卻是那麼的嬌小。她一定是非常的堅強。」(轉引自 Kumar, 2004: 301)。後來這一位空軍上尉的談話，不斷的被其它的媒體重複的加以引用 (Rogers, et al., 2003)。從這一位男性空軍上尉的口中，以自己的身材和 Lynch 對比，以及突顯 Lynch 的堅忍，都充份展現出 Lynch 是一位英雄。

在2003年4月21日《時人雜誌》(People)封面報導的標題中，已充份顯露對於這一位受難英雄的讚美，該標題是「從危險中獲救：英勇的 Jessica Lynch 從被俘與虐待中存活下來，成為伊拉克戰爭中的英雄」。

《華盛頓郵報》記者在引述一位不具名的美國官員談話中提到：「Lynch 堅強的奮戰，射殺了許多的敵軍……一直到她彈盡援絕」、「她奮戰至死……她不想被生擒」(Schmidt and Loeb, 2003: A1)。美國參議員 Pat Roberts 也談到：「談到膽識，她是不屈不撓的。她堅信國家會來救她。」(轉引自 Schmidt and Loeb, 2003: A1)。這些言談都將 Lynch 一再的建構成是一位如好萊塢電影中由席維斯·史特龍所扮演的藍波角色。

Lynch 的受害者與英雄的雙重角色更從媒體對於其家鄉的親朋好友的訪談中得到強化與佐證。其親友在接受媒體訪談中提到，她在未從軍之前，就已兼具英勇與陰柔的特質。她曾當選過該郡的選美小姐，她也是一位運動健將，是壘球隊的隊員(Adler, 2003)。她也是一位喜歡穿得美美的女生，但同時也常與兄弟玩伏地挺身(push-up)與各式各樣展現力氣的比賽，因此，她是一位像男孩的頑皮女孩，但同時也是一位美人(Rogers, et al., 2003)。這些有關 Lynch 個人特質的描述，呼應了為何她會選擇從軍，以及在被俘後所展現出的堅忍性格。

其次，由美國國部所提供的影片中，可以看到訓練有素、

驍勇善戰的男性海軍「海豹」(Seals)與陸軍「騎兵」(Rangers)的特種部隊人員聯合從伊拉克的醫院中將 Lynch 加以解救出來。

(三)、場景分析

1. 事件的發生地

由美國國防部所提供的拯救行動影片中，事件發生的場景是在一間伊拉克的醫院。英勇的海軍「海豹」與陸軍「騎兵」特種部隊人員利用黑夜作為掩護，從空而降，進行拯救的任務，整個拯救的情節就像好萊塢的電影情節般，充滿神奇與戲劇張力十足。

2. 大環境

整件事是一種戰爭宣傳，其出現的時機正好是戰爭進行不順遂，以及未獲得聯合國授權而出兵，飽受各界批評之際。

由於戰爭的進展不如預期的順利，各種質疑的聲浪開始湧現。例如，作為解救伊拉克人民的聯軍為何在當初沒有設想到會遭到游擊戰的抵抗。此外，當初出兵所持的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對於國際社會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等理由，在聯軍攻佔一些伊拉克的城鎮後，也都未發現蛛絲馬跡。由於在此一種情境下，「英勇」與「戲劇性」拯救 Lynch 的事件，就扮演起引開民眾對於戰爭艱困面的注意力，而轉移至能支持戰爭的英雄故事(Kumar, 2004)。

二、事件分析與討論

(一)、事件真相

在 Lynch 獲救不久後，整個事件的真相開始逐一浮現。拯救 Lynch 的假事件是由英國 BBC 首先公開揭發。在 2003 年 5 月 15 日 BBC 記者 Kampfner (2003) 分別在 BBC 網站與英國《衛報》刊登對於 Lynch 拯救的調查報告。BBC 於 2003 年 5 月 18 日製播了名為「戰爭公關」(war spin) 的記錄片，指控美國國防部是拯救行動的策劃者，並使用此一故事來達到宣傳的目的 (*The Guardian*, 2003, May 15; Kumar, 2004)。英國倫敦《時報》也報導目擊者證詞，表示整個拯救事件是經過美國國防部的精心策劃 (Anderson, 2003)。

在 BBC 的「戰爭公關」記錄片中，Kampfner 在訪問了伊拉克醫院的一些目擊證人與醫護人員後，總計提出了五大疑點 (Kumar, 2004: 304-305)。

第一、Lynch 並沒有受到槍傷或被刺傷，而是因為交通意外事件而受傷。第二、她在醫院中受到非常好的治療與照顧，醫院還提供僅有的一個特別病床給她使用。第三、美軍在拯救行動前就已接獲醫院中的伊拉克士兵皆已逃走的情資，因此，也瞭解營救的軍事行動其實是不需要的。第四、整個營救的軍事行動是由軍方所拍攝、剪輯，並傳送給隨軍坑入採訪的記者，主要目的是為了確保能夠被「正確」的報導。第五、在拯救 Lynch 的軍事行動前兩天，伊拉克醫院的

醫師曾試著用救護車載著 Lynch，要將她送回美軍，但中途被美軍開火，因而作罷。由此可見，營救的軍事行動是不必要的。

Kampfner 在接受 CNN 專訪時，曾為自己的調查報告辯護說，他曾請美國國防部將整個未經過剪輯的營救影片提供給媒體，而不是僅公佈 5 分鐘版本的影片，但遭到國防部的拒絕 (Harris, 2003)。CNN 一位隨軍坑入記者對於 Kampfner 所提到的伊拉克醫師曾企圖將 Lynch 送回美軍一事曾加以查證，其結果是與 Kampfner 的陳述相同 (Kumar, 2004)。

在事件發生後的半個月，美國媒體訪問了曾醫治 Lynch 的伊拉克醫生，該名醫生表示，在美軍突擊醫院前，伊軍的部隊與執政的社會復興黨領導階層已在前一天逃離，因而並未遭到任何的抵抗。美軍宣稱伊拉克在醫院派遣重兵防衛一事，與事實不符，因為除了醫護人員與病人外，並沒有任何的武裝力量 (*中國時報*, 2003, 4 月 17 日: 11 版)。

英國 BBC 在 2003 年 5 月 15 日的報導中就曾指出，拯救 Lynch 事件是美國國防部所導演出來的故事。

BBC (2003) 在報導中更進一步指出，Lynch 被伊拉克俘虜和被美軍特種部隊解救的故事，成了在這場戰爭中的偉大愛國故事，然而卻是所有新聞操縱事件中，最令人暈眩的一次。該報導引述曾醫治 Lynch 的醫生的話表示，美國的媒體報導說，她受了刀傷與槍傷，且在醫院中還受到了毆打審訊。然而事實上，在 Lynch 的身上，根本就沒有發現任何的子彈與

刀傷的傷口。該名醫生表示，整個拯救的情節「就像好萊塢的電影一樣。他們手持著槍，裝填著空包彈，伴隨著空的爆炸聲，然後大喊著，快！快！快！快！他們將進攻醫院表演給美國人看，像是史特龍或是成龍的動作片。」（轉引自 BBC，2003）。該名醫生指出，在醫院中，已給予 Lynch 最好的照料，不僅給予一張專用病床，還指派醫院中僅有的兩名護士中的一位，來照顧她。

BBC (2003) 在報導中，除揭露了美軍拯救 Lynch 的好萊塢思維與手法外，認為是受到曾擔任美國國防部顧問，導演「黑鷹計畫」的布魯克海默的影響，直接將電影的手法搬到電視的螢光幕上。

Lynch 的故事終於在 2003 年 11 月透過其自傳與美國 ABC 的專訪中，有機會親自陳述整個事實。Lynch 在其自傳《我也是個軍人：潔西卡·林區的故事》一書中，說出了事件的經過與感想。此外，她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表示，其部隊受到攻擊後，她的槍卡住了，既沒有開槍，也沒有殺一兵一卒，當時還抱頭跪地向上帝求救，並沒有如先前媒體所報導的英勇事蹟。她對美國突擊員的營救表示感謝，但對軍方的處理方式有所抱怨。她說「我覺得很困擾，他們竟利用我大肆宣傳，這樣做不對。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拍下救人的過程，也不知道他們要說些有的沒有的……」（轉引自聯合報，2003，1108：A14 版；Kumar，2004）。

因此，整件事的真相是 Lynch 與部隊同僚因為走失，誤

闖伊軍陣地，而非受到刻意的伏擊，且戰況並不是如美國國防部所說的非常激烈，而 Lynch 的部隊是被一枚火箭榴彈擊中，她所乘坐的悍馬車在混亂中撞上另一輛車，才使得她受傷（自由時報，2003，0723：12 版）。

（二）、事件的目的

Kumar (2004) 指出，整件事是一種戰爭宣傳，其出現的時機正好是戰爭進行不順遂之際，以及出兵飽受批評之際，此一事件可以將輿論的焦點做適度的轉移，也就是以情感面而非理性面來討論戰爭的一種策略。

Kumar 進一步表示，此一事件可以達成兩種目標：首先，將 Lynch 塑造成為負傷英勇作戰的英雄，可以為美國正在解放伊拉克民眾來加以辯護，並顯示出對於女性的重視；其次，可以作為贏取戰爭支持的一項策略性機制。

（三）、為何選擇 Lynch 作為被拯救事件的主角？

在 Lynch 的拯救故事中，值得思考的是，在同一時期內，除了 Lynch 外，是否還有其他的美國女性可以被建構為「美國鄰家女兒」（all-American girl next door）的英雄形象代表呢？如果有，為何未被用來作為英雄塑造的題材呢？

Kumar (2004) 指出，美國女性英雄與甜心的建構受到美麗、種族與政治這三項因素的影響。以 Lynch 的故事建構為例，在同一時期內，尚有兩位英勇的美國女性事蹟，但並沒有受到政府和媒體的青睞，這兩位分別是 Rachel Corrie 與 Shoshana Johnson。

Corrie 在 Lynch 被俘擄之前的一週遭到殺害，其背景與 Lynch 非常的相似，都是屬於金髮美女型，只不過她在政治上選錯了邊，因為她的作為與美國外交政策相左。她為了阻止以色列兵士濫殺巴勒斯坦的平民，因此前往巴勒斯坦參加抗議活動。但不幸的是，她在抗議的過程中，慘遭以色列人駕駛著美國製的推土機碾過，而當場身亡。儘管有目擊證人指證，她是被刻意殺害的而不是意外死亡，但這位捍衛人權女鬥士的新聞大概在見報兩天左右就無影無蹤了 (Klein, 2003)。

Johnson 則是與 Lynch 一樣，都參與了 2003 年波斯灣戰爭，她也是隸屬於 507 維修連。Johnson 的境遇與 Lynch 相同，都在戰爭期間被俘，她與 4 位男性同胞是在 3 月 23 日受到伏擊後被俘。半島電視台在 4 月 24 日的新聞中播出他們被俘的畫面，隨後伊拉克電視台也播出該則新聞。他們這些戰俘在 Lynch 獲救後的 12 天也被救出。Johnson 是留著綁成條狀髮型的典型黑人女性，儘管與 Lynch 有著相同的境遇，但由於不是典型美國鄰家女兒的類型，她的被俘故事並沒有受到媒體多大的關注 (Kumar, 2004)。

Kumar (2004) 的分析指出，選擇白人女性可以作為「美國與西方」來與「回教與中東」區隔，也就是白皮膚對黑皮膚、好人對壞人的二分法。

(四)、事件分析

在整個事件的傳誦過程中，由於在救援後的一段時間

內，Lynch 無法自己親自說明事件情況，使得許多的匿名政府官員可以有空間來建構這個英雄的故事 (Kumar, 2004: 301)。

整個事件就是一種假資訊與假事件策略的運用。在每一個戰爭中，敵我雙方大都會利用各種傳播管道與工具來散播假資訊，因此，2003 年波斯灣戰爭當然也不例外 (Kumar, 2004, 2006; Kellner, 2005)。基本上，在衝突與戰爭中，由軍方所提供的消息在事後再更正時，通常並不是無心的錯誤，而是經過策劃的假資訊策略。Lynch 會被挑選作為宣傳的主要原因是符合宣傳的目的。而事件的真相之所以未能被媒體及早揭發的原因是，軍方以 Lynch 在受傷後有失憶症，無法完整的陳述事實經過為由，不讓媒體進行接觸與採訪 (Kumar, 2004)。

為何在 BBC 揭發整個事件後，美國主流媒體並沒有限進報導呢？主要原因就如上文與文獻探討中所指出的，因為這是一個感覺很好的故事、媒體在戰爭迷霧中依賴官方的消息來源、以及媒體與軍方的合作結果是互利的。因此，媒體在整個事件中，是出於自願而不是在被迫的情況下來加以傳播。Lynch 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後，媒體的具體收穫是收視率的提高與廣告收益的增加。在 2003 年 6 月甚至出現美國多家媒體同時在競標 Lynch 來親自上節目說明。《華盛頓郵報》記者 Getler (2003: B6) 曾寫道，Lynch 的故事：「將是在整個戰爭中令人記憶最深的一件事，此一事件具有很大的宣傳價

值。儘管整個事件是虛假的，但直到該事件沒有任何價值時，才會被丟棄。」。

除了上述這些原因外，主要是因為 Lynch 的故事與國家與國家主義間有著密切的關聯。Makolkin(1992)曾在其研究英雄傳記與國家主義中指出，個人傳記與國家與國家主義間有著密切的連結。

以《新聞周刊》與《時人雜誌》有關 Lynch 的封面報導為例，兩個雜誌都著重在 Lynch 本身、她的家鄉與她的生活的點點滴滴等，就都與國家與國家主義有著關聯性存在(Kumar, 2004)。Lynch 本身代表著國家，她為了保衛國家的利益而從軍，並且英勇的前往危險的戰場。而 Lynch 也突顯出來美國社會的善良面，她如同鄰家的女兒般，有著金髮、碧眼、美麗與溫馴的個性，生活在美國的一個純樸的小鎮。就如同一位 CNN 記者所報導的「她不僅是 Lynch 家的女兒。她是每一個人的女兒，每一個人的姐妹。」(Davis and Harris, 2003)。

整體而言，美國主流媒體的報導顯現出來的 Lynch 形象是與美國相同的，都是無情 911 恐怖攻擊的受害者，但同時也是為了抵抗恐怖主義，為了保衛國家安全而投入戰爭的英雄。

第五節 結論

Karl Kraus 曾說過：「世界如何被統治且導入戰爭的？外交人士向記者說謊，等刊登之後並相信這種謊言。」(轉引自楊月孫譯，1995：150)。這一句話一語道出了，欺騙，特別是透過媒體所散播的假新聞與假事件的欺騙，似乎已成為了公關化政治與戰爭的風格之一。

Fiske(1996)曾在分析 1991 年波斯灣戰爭中的科威特醫院保溫箱的嬰兒棄置事件時指出，此一假事件是透過下列方式在進行：1. 編織一套「可信」的事件；2. 挑選可信賴、有同情心、具豐沛情感與表達天份的證人(控訴者)；3. 在重要的論壇發表聲明(如國會中作證)；4. 使該事件透過媒體散播，以取得正當性與合法性；5. 矇騙具有可信度的人權團體配合演出(如國際特赦組織等)。由 Fiske 的分析可知，虛假事件除了要具備 Boorstin 所提出的四個特徵外，更重要的考量是如何將事件傳送出去的具體作法。

媒體虛假事件是人為精心策劃的產物。在日益公關化的戰爭下，虛假事件可以被用來作為醜化敵人與激勵已方民心士氣的工具。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中的科威特醫院保溫箱暴行事件與 2003 年波斯灣戰爭中的拯救 Lynch 事件中，有著許多的共同點，兩件事的場景都在醫院，主要的主角都是女性，都是與海珊的暴行有關，但卻扮演著不同的宣傳戰目的。前

者主要是在為開戰尋求正當性，主要是在將敵人妖魔化，後者是在塑造英雄形象話題，轉移媒體對於戰爭的注意焦點。

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曼曾在《紐約時報》撰文批評，美國的電視網是私有的，但其行為舉止卻像是國營的媒體（轉引自張巨岩，2004：24）。因為2001年911的恐怖攻擊激發了美國的愛國主義，再加上布希政府的公共關係推動下，美國主流媒體基本上都是支持與贊同反恐戰爭，很少有質疑與反對的聲浪。在2003年戰爭爆發後，連先前有猜疑的媒體也幾乎被「國旗所包裹」，成為發動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引擎（張巨岩，2004：22-23）。

愛國新聞學或許對於參戰國的媒體而言，可能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本身是危險的，因為對於決策者不僅無法發揮監督的功能，甚至是視而不見，因此，無法提供民眾足夠的資訊，來對於政府決策加以論辯。愛國新聞學將使得戰爭的報導成為宣傳，而不是新聞。正如同李普曼曾說過的：「我們必須記得，在戰爭期間，敵人所說的都是宣傳，而我方所說的則是事實與正義。」（轉引自 Kalb, 1994：6-7）。媒體工作者必須要引以為戒。

第肆篇 「視覺化」的新聞產製與再現篇

本篇計有三章，主要是以兩次波斯灣戰爭為分析對象，分別檢視國際電視媒體與網路媒體的戰爭新聞產製，以及電視媒體再現戰爭新聞的特色。

第七章敘述國際電視媒體的戰爭新聞產製，檢視國際電視新聞媒體的興起與概況，並且分別分析於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躍居國際新聞提供霸主地位的CNN，以及在2003年波斯灣戰爭中崛起有阿拉伯世界CNN之稱的半島電視台。文中除了探討兩家電視台的背景外，特別著重在戰爭新聞產製型式與內容的特點。

第八章分析網路媒體的戰爭新聞產製，探討2003年波斯灣戰爭為網路帶來新契機的現象，特別是戰爭部落格出現，提供了另類觀點的替代管道，以及網路新聞學發展所面臨的相關問題。

第九章敘述電視媒體再現兩次波斯灣戰爭新聞的特色，著重在公關化、科技化與媒介化戰爭中，以視覺影像為主的電視媒體所呈現出來的後現代主義的報導等特色，包括科技的迷戀、戲劇化、片斷化、個人化與表面化、權威、以及消失的美學等。